



評法家的歷史作用

下集

400135

# 评法家的历史作用

下集



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 
基本馆藏

# 评法家的历史作用

下集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五年·长沙

评法家的历史作用（下集）

本社编

\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1975年元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3109·385 定价：0.26元

# 列 宁 语 录

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，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。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。

判断历史的功绩，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，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。

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，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：……

# 毛主席語录

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，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，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。

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，决不能割断历史。但是这种尊重，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，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，而不是颂古非今，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。

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，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论王充的反儒斗争·····           | 钟 达(1)       |
| 论曹操的法家思想·····           | 曹晓波(12)      |
| 三国时期的法家政治家诸葛亮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 ·····成都武侯祠文物管理所 四川大学中文系 | (22)         |
| 范缜和他的《神灭论》·····         | (33)         |
| 《齐民要术》和法家思想·····        | 李 群(39)      |
| 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·····        | 梁 效(48)      |
| 柳宗元的尊法反儒思想·····         | 谭绍鹏(59)      |
| 王安石——北宋时期杰出的法家·····     | 邓广铭(69)      |
| 沈括和他的《梦溪笔谈》·····        | 李 群(83)      |
| 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李贽·····       | 庆 思(93)      |
| 王船山是怎样评价秦始皇的·····       | 周一良(109)     |
| 严复——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 ·····孙克复 关 捷 张凤仙        | (122)        |
| 章太炎早期的反孔尊法思想·····       | 宗 英 群 松(136) |

# 论王充的反儒斗争

钟 琦

王充是东汉前期的唯物主义者，是公开举起“伐孔”、“刺孟”的战斗旗帜的进步思想家。

王充所处的时代，是孔孟儒学取得独尊地位的时代。

西汉王朝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，它继承了秦王朝的政治路线，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宣帝刘询都是尊法的。到了西汉末期，随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，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发生了变化。世家豪族地主的势力越来越大，土地大量兼并和集中，农民被迫流离失所。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，激起农民的反抗，到处举起起义的火把。地主阶级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吓破了胆，他们一面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，一面乞灵于孔孟之道，大肆提倡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孔孟儒学，主要是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，作为麻痹、瓦解广大农民斗争意志的精神武器。从汉元帝刘奭开始，儒家思想在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已经占了统治地位。汉光武帝刘秀依靠世家豪族残酷镇压了绿林、赤眉起义，建立东汉政权以后，对儒学更加大力提倡，竭力宣扬被称为“图讖”的神怪预言。谁对孔丘和儒家那一套反动迷信的东西稍有怀疑和不敬，就要被扣上“非圣无法”的罪名，有丢掉脑袋的危险。公元七十九年，汉章帝刘炟亲自主持



王充



了大规模的白虎观经学讨论会，把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论加以条理化，儒学的地位也提得更高。

面对这股独尊儒术的逆流，王充挺身而出，不怕讥笑，不怕迫害，写出了《论衡》一书。把矛头直接指向儒家的祖师爷孔丘，提出：“追难孔子，何伤于义？”“伐孔子之说，何逆于理？”表现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勇敢战斗精神。

在《论衡》一书中，最有光彩的篇章是《问孔》、《刺孟》。在这里，王充以孔丘、孟子的代表作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靶子，从他们的言行中找出“相违”、“相伐”的大量事实，运用形式逻辑，尖锐地揭露了他们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的虚伪性和反动性。

孔丘不是宣扬“仁义”吗？他口口声声说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，但是，却很想到佛肸和公山弗扰那里去做官。子路问他，你不是说“亲身做坏事的人，君子不去他那里”吗？他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，一会说是想实行他的政治主张，一会又赤裸裸地宣称，我不是瓠瓜，不能挂着做样子不吃饭。王充指出，孔丘讲话没有准，办事也不会有准。他把自己比做瓠瓜，说做官是为了混饭吃，“何其鄙也”；他同公山弗扰、佛肸等坏人勾勾搭搭，又“何其浊也”。在这里，王充提出了问题，但没有看出孔丘在政治上的反动本质。实际情况是，公山弗扰和佛肸，当时都是企图推翻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叛乱分子，孔丘想到他们那里去做官，乃是为了捣垮鲁国和晋国的革新势力，实现其“使周代的制度在东方复兴”的野心。孔丘这个维护奴隶制的顽固派，对于革新势力是恨之入骨的。涉及到政治问题，他就完全抛掉“仁义”的伪装。以宰予昼寝为例。宰予打瞌睡

本来是一件小事，孔丘却摆出一副恶霸脸孔，大骂宰予是“不可雕”的“朽木”，是“粪土之墙”。王充认为，宰予犯了打瞌睡这样的“小过”，孔丘把他比做不堪造就的朽木粪土，是小题大做了，不足以服人。实际上，孔丘骂宰予是事出有因的，是因为宰予政治上同他有分歧，不同意他的政治主张。

孔丘不是宣扬“礼”吗？他的最得意的学生颜渊死了，他哭得好像很伤心。可是，当颜渊的父亲请求孔丘把车子卖掉给颜渊买口外棺的时候，孔丘却马上板起面孔，一口拒绝，说什么“大夫出门不能步行”。还对别人说：“我儿子死也没有给他买外棺。”王充指出，孔丘为了保持大夫身分，不肯卖掉车子为学生和儿子下葬，是贪恋官位，爱摆架子。他质问孔丘：你说“君子杀身以成仁”，为什么不能放弃爵位来坚持“礼”呢？在这里，王充尖锐地揭露了孔老二言行不一及其所宣扬的“礼”的虚伪性。但是，他没有从政治上看到“礼”的反动本质。事实上，孔丘的“礼”是为政治服务的，他鼓吹“复礼”，就是要复辟西周奴隶制。

孔丘不是宣扬“信”吗？其实他的假话是说得最多的。孔丘曾经叫嚷要跑到中原以外的地方去。王充就质问他，你的政治主张在中原还行不通，在中原以外的地方怎么能行得通呢？你不是说，那里的事情比中原更难办吗？好办的地方都行不通，难办的地方就行得通吗？王充正确地指出：孔丘并不是真的想到中原以外的地方去，而是有意撒谎。他骂别人是强嘴利舌的“佞者”，其实他自己正是一个言行不一的“佞者”，一个伪君子。说假话，这是一切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共同特点。他们为了实

现其反动政治主张，总是嘴上说的是一套，做的又是一套。孟轲就曾经说过：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。”叛徒、卖国贼林彪也说：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。”这恰巧反映了这些没落阶级代表人物的腐朽性和虚弱性。

王充是反儒斗争的战士。他虽然没有从路线上批判孔丘的反动本质，但是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能这样大胆地指着孔丘鼻子，骂他又鄙、又浊、又贫、又佞，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。这种尖锐的批判，一直激励着后来进步的思想家的批孔斗争，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是深远的。

在《刺孟》篇里，王充对孔丘的继承者孟轲所宣扬的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的反动观点的批判，是很有光彩的。孟轲说：每过五百年一定会有英明的帝王出现，那中间一定有闻名于世的人产生出来。王充认为，孟轲的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。帝誉、尧、舜、禹都是“王者”，他们是“继踵而兴”的，没有隔五百年，由周到孟轲已经过了七百年，也没有兴起“王者”。五百年是上天生“圣人”的期限吗？如果是的话，到了期限，上天为什么不准时生一个“圣王”呢？王充指出，孟轲满怀“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”的政治野心，由于没有掌握到政治权力而“怀恨”，所以尽说些经不起事实考验的骗人的“浮淫之语”。王充批驳孟轲所发挥的这些思想，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。作为封建社会的先进思想家，王充主张革新，反对倒退，因此他敢于向儒家的“天才论”宣战。修正主义的头子林彪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，亦步亦趋地跟在孟轲之后，叫嚷“天才”几百年、几千年才出现一个，实际上是大树特树他自己。他这种反

动观点，正是王充在一千九百年以前在批判孟轲时就驳斥过了的。当然，王充还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来彻底地批判这种反动的“天才论”，这个任务只能由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。

王充的《论衡》，有力地驳斥了孔孟天命论在汉代的翻版——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。

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论，把天说成有目的、有意志的最高主宰，把世间万事万物说成是天有意识地创造和加以安排的。人如果顺应天的意志，天就降福，否则就降祸。他还炮制了“君权神授说”，宣扬“王者承天意以从事”，谁反对皇帝就是逆天，假借“天意”来肯定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和合理性。

王充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，吸收了汉代天文学和医学的成果，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这些谬论。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气形成的，天和地一样是没有感觉、目的和意志的物质实体。“天道，自然也，无为”<sup>①</sup>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和发展的，根本不存在什么创造和安排世界的最高主宰。“人不能以行感天，天亦不随行而应人”<sup>②</sup>。孔丘和儒家的经典动不动就讲天命，其实只是吓唬和愚弄人民罢了。这样，王充就继承和发挥了荀况“明于天人之分”的唯物主义观点，有力地冲击了君权神授的基础。王充还针对儒家提出的天能降祸降福以及自然灾害是上天对人君的“谴告”的观点，考察了当时所谓灾异，如日月食、地震、雷雨等，指出这些都是自然现象，绝不是上天的“谴告”。他认为儒家编造的“谴告”是和“礼”

---

① 《论衡》

② 《论衡》

一起搞出来的。上古时候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“谴告”。只有“末世衰微，上下相非，灾异时至”，即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、矛盾重重，灾异很多的情况下，才“造谴告之言”。所以他说：“谴告之言，衰乱之语也”<sup>①</sup>。就是说，“谴告”的出现，反映了统治阶级政治危机的加深。王充虽然没有表明反动统治阶级利用“谴告”转移人民斗争视线、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阶级本质，但他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，指出它是同政治斗争有着密切联系的，在当时，这也是很高明的见解。

王充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唯物主义者，他坚决宣传无神论，反对当时流行的宗教迷信。他提出了关于形体和精神关系的著名论断：“天下无独燃之火，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？”<sup>②</sup>他指出精神是不能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，从而否定了一切鬼神的存在，这是对天人感应神学的有力批判。他的战斗成果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。王充以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，如范缜、吕才、张载、王夫之，都受过他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。

坚持法家主张革新、前进的观点，反对儒家“好高古而下今，贵所闻而贱所见”的历史倒退论，也是王充《论衡》一书的鲜明特点。

董仲舒叫嚣“奉天而法古”，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，大肆鼓吹“今不如昔”的谬论。他诋毁汉朝由于继承了秦的法治而腐败得象朽木泥墙一样，无法修补，只有推行孔孟之道即开历史倒车是唯一的出路。王充是肯定商鞅的耕战政策的，认为它取

---

① 《自然》

② 《论死》

得了“为秦开帝业”的重大成果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秦王朝的进步作用。他指出，怀有今不如昔、汉不如周的成见的俗儒，认为凡是古代的东西都好，越古越好，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。在《宣汉》、《恢国》等篇中，王充高度评价刘邦打败项羽分裂势力、建立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的成就，对汉朝的建立和西汉前期巩固中央集权、打击分裂割据势力的措施作了充分的肯定，他认为，“秦汉之际，功奇行殊”<sup>①</sup>，但被儒家贬低和轻视了。他从各方面把汉代和周代作了比较，指出汉代国土的开辟远远超过了周代；在生产力提高方面，周代的荒野地区到汉代已有很多开成肥沃的田地；汉代在精神文化上也比周代发达。一切都证明“汉高于周”，汉“在百代之上”。他还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发展，举出古代的人吃不上五谷，也没有衣服穿，现在却“穿地为井，耕土种谷”，“有布帛之饰”等事实<sup>②</sup>，肯定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，驳斥了“今不如昔”的谬论。他嘲笑儒家说，你们“上则求虞夏，下则索殷周”<sup>③</sup>，对古代的东西津津乐道，但对于当代的成就却反而全不看在眼里，“知古不知今”，简直是昏昧透顶！儒家说“汉不及周”，鼓吹一代不如一代，是十足的反动的历史倒退论。王充肯定“汉高于周”，汉“在百代之上”，则坚持一代胜过一代，继承了法家的反复古主义的传统。

王充的反儒斗争，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的。这场斗争，实

---

① 《齐世》

② 《齐世》

③ 《齐世》

质上是先秦以来的儒法之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。但是，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，王充反对儒家的斗争是不彻底的。他在《问孔》、《刺孟》等篇中，对孔孟思想作了尖锐的批判，主要是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，揭露孔孟言行的矛盾、言论和事实的矛盾及言论本身的矛盾，没有抓住路线问题。在《非韩》篇中，王充对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态度显然和对待儒家的态度不同，但是对韩非的政治主张的评价是不正确的。他指责韩非只讲耕战，不讲礼义；只讲刑，不讲德，认为儒者是代表礼义的，不可缺少，不同意韩非关于儒居于“五蠹”之首的观点。这恰恰暴露了他不能从路线上分析问题。在讲到秦统一六国时，他也没有抓路线问题，只说是“秦以兵强，威无不胜”。至于秦为什么强，他就说不上来了。

为什么王充会写出《非韩》篇呢？

第一，他没有看清法家和儒家是互相对立的政治力量，没有把儒法斗争看成路线斗争。法治还是礼治，这是从先秦到西汉儒法斗争中的一个突出问题，其实质就是巩固地主阶级专政，还是复辟奴隶制。“复礼”是奴隶制复辟势力抛出来的反革命政治纲领，而“明法”则是新兴地主阶级巩固封建制的战斗口号。韩非认为“法”是最高的原则，他说：“令者，言最贵者也；法者，事最适者也。言无二贵，法不两适”<sup>①</sup>，而斥儒家的“礼”是“乱之首”<sup>②</sup>，观点十分鲜明。王充却企图把这两个对立面调和起来，把它们说成是相辅相成、不可偏废的，因而指责韩非

---

① 《韩非子·问辩》

② 《韩非子·解老》



“废德”“任刑”是走偏了方向。在这个问题上，王充比起韩非来，就后退了。

第二，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儒家的思想影响。随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，地主阶级和奴隶制残余势力日益走向妥协，联合起来镇压农民起义。这时，儒家也将“礼治”改头换面，打扮成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“德治”，以适应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。他们吹嘘“德治”，说什么“汉德宽厚，民无二心”，强调“德治”有巩固统治阶级内部团结和欺骗人民的作用。这一转变对东汉前期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桓谭、王符等人也都发生了影响，对王充也不例外。尽管王充曾反驳过儒家关于“德治”的吹牛，指责孔老二要人民饿着肚皮谈礼义，但是，他还是受到了“德治”的观点的影响，并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看待历史上儒法两家关于法治和礼治的争论，结果竟得出了与他自己的反儒斗争精神相矛盾的结论。

历史经验表明，儒法斗争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。反儒，而不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，不从儒家的阶级本质上批判他们的政治主张，不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，是不能彻底打败儒家思想的。而这正是为什么王充勇敢地举起了批判儒家的战斗旗帜，但反儒不彻底的关键所在。这个彻底批判儒家思想的历史任务，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。毛主席指出：“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，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，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。”我们用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，并把历史经验同现实的